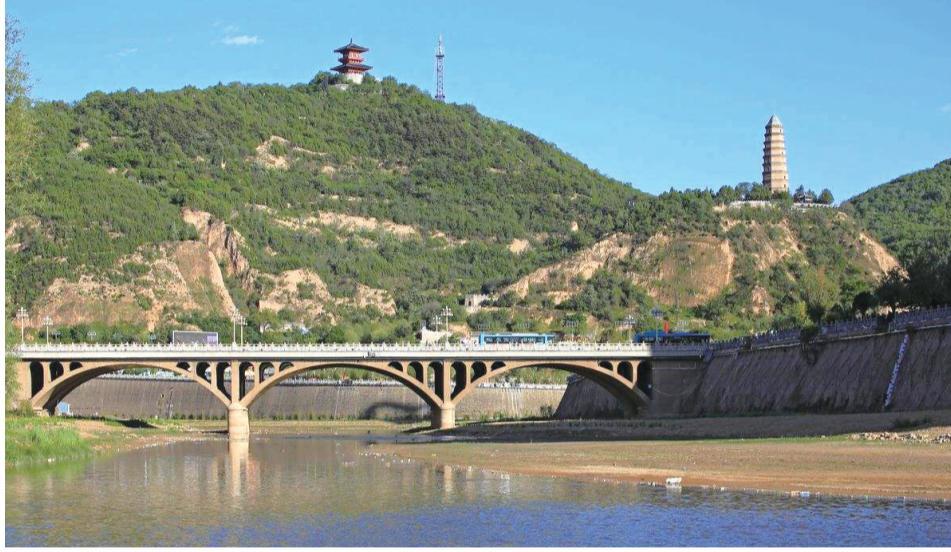


在新时代生活中坚持“中国精神”方向

□陈培浩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从立场与世界观、方向与性质、普及与提高等方面提出了创造性论述,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乃至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性文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也成为塑造“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奠基性话语。《讲话》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期文艺主要矛盾而作出的科学论述,在新时代背景下纪念和学习《讲话》,绝非机械地套用《讲话》的全部判断,而是辩证地把握《讲话》论断背后的文艺思想方法。



《讲话》的生活源泉说可谓耳熟能详:“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在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艺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朴素论断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今天对这个科学论断的学习不仅是把它作为教科书般的文学理论来重温,更要跟文学现场结合起来以扬清激浊。

新时代的文艺应反对造假的生活、片面的生活和缺乏方向的生活。所谓造假的生活是指很多作家在对生活缺少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对生活现实的随意编造以及把某种生活现象夸大为整体性生活的写作倾向。在不少消费化的畅销小说中,极度物质化的都市生活场景充斥其间,从中我们看不到复杂生活的其他面相,这就是生活的造假,用一种刻意营造的生活来替代真实生活本身。还有一些作家,他们对生活的理解比较片面和机械化,缺乏应有的纵深,作品提供的仅是同步于生活的表象碎片。《讲话》强调文艺源于生活的同时要高于生活,这里的“高于”既是艺术上的更集中、更强烈,也是思想上的更典型、更理想,这意味着文学必须对生活表象进行合乎艺术和伦理逻辑的重构。即使是很多著名作家,他们的写作在艺术重构方面都遭遇了滑铁卢。有的作家热爱世界赞美生活,这当然值得提倡。但是我们最不缺的便是对生活廉价的赞美,不能深入到新时代生活的内在结构去赞美,流于表象的赞美同样不能“高于生活”,同样不是有益的现实主义。

还有另一种写作,对生活也有深刻的观察,在艺术上也不乏独到的追求,这种写作醉心于指出现实的病灶、荒诞和虚无,但于虚无的拯救方面却没有更进一步的作为,这种写作提供的是缺乏方向感的生活。缺乏精神方向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学重要的困境和危机。现代主义文学说出了存在的虚无却陷于颓废的深渊。身处总体性崩溃的现代性背景下,小说除了说出,还必须努力去确认。寻找源于生活的写作方向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二

《讲话》对文学规律的把握还体现于它对“普及和提高”关系的论述。在《讲话》的整体架构中,“普及和提高”跟“生活源泉”和“立场方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来源于当时火热革命生活的写作才可能在群众中普及,进而提高到符合“工农兵方向”的水平。在“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上,《讲话》坚持鲜明的文艺方向性。毛泽东在《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提高不是往资产阶级艺术那里提高,而是往工农兵方向的提高,这实质上在呼吁创造革命文艺的艺术精品。

对于新时代的写作者而言,必须深刻认识到《讲话》论断的历史性和规律性,《讲话》回应其特定历史的迫切性,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某些具体结论并不能机械地指导现实,但我们要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在源于生活并构建高于生活的文艺方向上,《讲话》对新时代的作家依然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新时代的写作当然不墨守“工农兵方向”,但是新时代的写作却不能忽略对方向的寻找和坚持。新时代的写作方向,便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

再强调的“中国精神”。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坚持写作的“中国精神”,就是坚持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坚持追求真善美的永恒价值,坚持把写作的根须汇入由优秀传统文化、优秀外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汇而成的中华文化脉络,从而把写作构建成直面中国问题、蕴含中国美学、秉持中国价值、彰显中国智慧的文明结晶。

三

新时代写作对“中国精神”方向的坚持,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坚持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路线是中国左翼文艺的重要面相。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应对民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发现中国大文化系统中缺少西方理性。在此意义上,五四的“德先生”、“赛先生”的核心既是现代化也是西方化,他们站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口,以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现代性话语提出了中国文化自新的革命要求。虽然五四知识分子在文艺上不乏对民间资源的重视,但其所秉持的是“西方化”话语改造中国文化的立场,这隐含了日后左翼革命文艺“重构五四”,确立中国思想和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1938年10月12—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首次使用“民族形式”和“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表述,实质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一般层次上指向“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在更高层次上指向建构中国工农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的“民族形式”。一般层次和更高层次构成了《讲话》指称的“普及”和“提高”,构成了左翼文艺的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得到吸纳和重视的主要是民间文艺资源。不难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贯穿着共同的“中国方向”,不同在于,新时代“中国精神”基于当代现实打开了更广阔的思想文化资源库,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辩证关系,在谈到中国灿若星河的文化名人时他说:“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始终把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始终把优秀民族文化和优秀世界文化紧密联系,要求在民族性、人民性、时代性、创新性和理想性的多重坐标中确立“中国精神”的深广度和方向性。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6周年,虽世代更替,《讲话》仍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光辉,这来自于其对文艺与生活那种来源与重构关系的把握,也来自于对文艺方向高屋建瓴的把握,这种思想方法在新时代文艺实践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上接第1版)

深入现实生活,汲取故事养分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谈到,近年来,现实题材在网络写作中稳步上升,但与玄幻、仙侠等相比,在故事编造上相对薄弱。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震古烁今的变化,但反映这一变化以及人民精神面貌变化的作品依然欠缺。网络作家要写好现实题材,不仅要直面生活,更要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延续文学传统中的“以事写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认为,书写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不能脱离自身特点,玄幻、穿越等作品类型依然可以承载现实题材的写作。从目前的网络文学作品来看,已经出现借助穿越方式反映现实题材的例子,值得作家与评论家们思考和研究。同时,既要鼓励新的创作,还要盘活已有的网络文学资源,激活作品生命力。

网络作家多一半为了写好一部脱贫致富的作品,在深入农村之后将设想的人物情节全部推翻,重新创作。他说,只有深入下去,才能把握作品方向,展现生活的喜怒哀乐,表达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情怀。

网络作家红九认为,写作最神圣的地方在于讲述一个正能量的故事,通过读者传递、循环、放大,让故事更加有意义。作者应该多阅读、多调查、多接触社会民生、多贴近现实、多感受生活,从现实中汲取故事的养分,写出具有时代意义、反映生活气息的现实题材作品,赋予作品经得住推敲的精神内核和长久的生命力。

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晨认为,网络文学需要更好地拥抱传统文化,在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等方面全面提升。当传播优势与有价值的文字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时,才能全力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根植传统文化土壤,推动网络文学走出去

近年来,中国网络小说出现了向国外翻译、出版、传播等现象,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底蕴魅力。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欧阳友权谈到,中国网络文学要走向世界,翻译工作任重道远,在翻译队伍、翻译质量、翻译环境方面均面临挑战,尤其是网络小说类型众多,体量巨大,故事奇特,更是给准确传达原著精髓兼顾信达雅增加了翻译难度。

鲁迅文学研究院研究员王祥认为,中国网络文学为

和任何思想成果一样,毛泽东1942年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既有具体的时空背景,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个具体的、特殊的时空背景,就是抗战的现实需要和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于各抗日根据地来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的整个进程,被毛泽东概括为“革命机器”。他这样来规定“文艺”和“革命机器”之间的关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今天,抗战的需要和根据地的发展无疑都成为历史,那么,这是否意味《讲话》也失去其现实意义而只能作为一份历史文献而存在呢?

具体时空条件固然发生了变化,但《讲话》本身的意义却不会因为这种具体时空条件的变化而消失。毋宁说,具体时空条件的变化,更凸显了《讲话》所蕴含的普遍性。不仅如此,《讲话》还具有一种新颖的新颖性,并提示了五四以来更新形态的文学的轨迹。在这一个意义上,《讲话》是一个开放给未来的文本。

“为人民的文艺”与《讲话》的普遍性

《讲话》固然是基于抗战的历史条件而出现的,但抗战并不构成《讲话》的惟一动力。抗战联系着自近代以来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而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又联系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前景。同样,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也不是孤立的现象,毋宁说,它们是民族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前景的试验场,是未来新中国的前身和缩影。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基于抗战和边区的历史环境而产生的《讲话》及其所规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就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现实需求,而所谓“文艺”也就不能在一种“压抑和自主性”的对立格局中来认识。需要讨论的反而是,现阶段的文艺能否有足够的潜力去承接这样的历史要求。

“文艺为政治服务”,那么,什么是政治?毛泽东说:“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但很显然,在现实推行的过程中,政治很多时候是被理解为“少数政治家的政治”,而这样的政治,只能是和权力、发号施令和官场作风,和眼前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在此,不是文艺,而是首先这种“政治”背离了“人民大众当权”的政治前景。

而一旦我们重新用“群众的政治”来充实和激活那个被窄化的“政治”,则“文艺服务于政治”就立刻获得了新的内容。尤其是,“群众的政治”即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大众当权”乃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状况,则“文艺服务于政治”赋予文艺以契机,即使文艺从以往各种狭隘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去碰触那几乎是最高也是最复杂的课题。

首先,“政治”的最终诉求是“人民大众当权”,这一诉求因为其空前未有,而占据了一个近乎于真理的位置,将文艺和这样真理性的诉求关联在一起,丝毫不对于文艺的压抑,而是对于文艺的一个要求。它促使文艺尽量地伸展自己,以发挥出其所有的潜力。而且,这里的真理不是凝固的,而是作为未来的、始终在动态生成的真理而存在。就此说,文艺的“服务”,也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也正是因此,所以《讲话》才反复提出作家改造的要求。

其次,“政治”不仅因为其高度而占据真理的位置,而且更因为其广度而和现实重叠。在一个几千年来以等级制为基本社会组织形态的国家里,试图让长期处于底层的民众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其所掀起的波澜必然是根本性并且全面性的。这必然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都发生的革命行动。在此,所必然出现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都将是以往的历史所未见。文艺来描写这样复杂深刻的现实变动,自然更不是对其自主性的压抑。

将文艺和这样空前的历史任务对接起来,是《讲话》中“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核心内容。抗战只是这样的历史任务中的一个环节。也正是因此,所以《讲话》虽然以“服务”来规范文艺的使命,但文艺并不因此就局限于特殊性之中,反而充分表现了它的普遍性。“为人民的文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等等提法正是其普遍性的简要表达。

即使不从《讲话》的政治远景,不从《讲话》的“政治”所具有的高度和广度,而仅从最一般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认识,“为人民的文艺”依然具有恒久的普遍性。“文艺为人民服务”因为在各种文艺政策中被反复提及而变得司空见惯,也因为其司空见惯而常常被人忽略。只要稍具历史视野就能知道,确立“为人民的文艺”乃是经历了长期艰巨的革命斗争才获得的。正如《讲话》清醒意识到的,相比于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无产阶级的文艺、“为人民的文艺”在任何方面都是崭新的。这一点,即便是结合今天文

重新认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普遍性和新颖性

艺界的状况来认识,也一目了然。把“为人民的文艺”确立为大经大法,不仅是“文艺”本身成长的需要,也是“人民大众当权”的“政治”的必然要求。

“做群众的学生”与《讲话》的新颖性

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讲话》是被看作存在与五四以来文艺潮流延长线上的一篇文献。这种连续性的视野有相当的历史依据,《讲话》对于由五四文艺、革命文艺所连缀起来的文艺脉络有相当自觉的继承意识。但是深入分析,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讲话》所蕴含的新颖性。《讲话》虽然也重视对既有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改造,但更看重培养边区自己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培养新的作家并开拓新的文艺类型。

在《讲话》中,“普及”和“提高”是放在“如何去服务”这个总问题下来展开的。“如何去服务”自然首先是对于外来的作家提出的问题,因此“普及”和“提高”的主体当然也就是这些作家。但是,当普及和提高的工作展开之后,这个旧的主体就面临着一种不可避免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并通过自我否定从主体变为客体。新的主体,则是原来扮演被普及和被提高之对象的“工农兵”。

就像《讲话》所说的,“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而用以普及的东西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东西,也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而只能是“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在《讲话》中,这种“东西”也就是能促使“人民群众当权”的意识、知识、思想以及行动能力的综合体,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能力。而当我们意识到,原来的作家因为没有很好地和人民群众结合,没有和军事战线结合,身上总是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在这里就必然出现一个难题,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即作家们要用自己本来不具有的东西来向本来就有那种东西的工农兵群众进行普及和提高。这就不仅首先要求“在教育工农兵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或者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而且在做了群众的学生之后,“先生们”所能做到的普及和提高,就其实质来说,也只能是把工农兵身上原有的那些求取“人民群众当权”的思想和行动能力变得更纯正、更明确、更自觉而已。这不是要教给工农兵所不知道的东西,不是外部灌输的问题,而是促使既有的萌芽更健康更茁壮的问题。在这里,存在着对于五四以来的启蒙逻辑的根本性改写。

因此,所谓提高就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对于原来的作家来说,的确需要改造,但所谓改造并不是说让这些作家更加具有教育的资格,所谓深入群众,也不只是说接近、了解、研究、做知心朋友就足够了。这些是需要的,但所有这些深入群众自我改造的目的最终不是要把自身变成更好的作家,而是要促使作为作家的自己消弭于那代表着“前进方向”的工农兵群体中去,也就是扬弃自己固有的作家身份而汇入那推动“人民群众当权”的历史洪流之中。

简捷地说,这种作家身份的消弭,也就是那种把文学狭窄化并且圈子化的惯性的消弭。旧的作家扬弃自己旧的作家身份和作家意识,从而促使文学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财富。在理论上,开辟让人民群众都成为作家的道路。这也相应地要求旧的文学的内容、形式、读者、作者、创作方式、传播方式等等各个方面都要发生变革。就如《讲话》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文学的专门家要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的小剧团,音乐专门家要注意群众的歌唱,美术专门家要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句话,要注意所有那些处在“萌芽状态的文艺”。

因此,综合来看,“普及”绝不意味着在固有的脉络中降低文艺的难度,而是意味着新的创造,即对五四以来的文艺发展脉络和文艺的整个生产机制的改造,并从中锻造出新的作家和新的文学。

最后,还想指出一点,面对《讲话》,首先需意识到这是一个党的领导人基于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推出的思想成果。它固然是以文艺为讨论的对象,但文艺既不是思考的出发点,也不是思考的终点。相对于那个革命形势来说,文艺在此是一个媒介的角色,即要经由文艺抵达对于革命形势的理解。因此,《讲话》固然可以放在文艺理论的范畴中进行讨论,但首要的亦是最终的讨论框架只能是革命形势。也就是说,《讲话》首先是政治论述,其次才是文艺论述。而所谓“政治”,就是“人民群众当权”的历史进程。只要这一历史进程没有中断,那么《讲话》中关于“文艺服务于政治”的规定也就永不过时。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6周年

湖北组织荆楚作家走乡村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希望作家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凝聚人民群众的拼搏精神和首创精神,突显文学的力量,彰显美丽乡村的丰富内涵,走出精气神、走出好作风、走出新成果。

活动期间,作家们前往历史文化名镇当阳清溪镇的民俗博物馆等地参观,参与了当阳庙前镇沙河村探访“关雎”主题旅游项目等活动。大家表示,此次采访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生活积累和写作素材,而且进一步提升了思想境界,对三农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下一步在创作中将重点关注美丽乡村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特别的发展思路和精神追求,努力求新求深,避免同质化写作。(尔容)

世界好故事提供了宝库,其创作特点和魅力为海外传播提供了无限可能。网络文学的可理解性建立在人类思维认知结构之上,又具有情感普适性,这将推动东西方大众文艺共同建构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版图。

网络作家天蚕土豆以新书《元尊》翻译为例谈到,数字全球化让网络文学跨越了国界和文化的阻隔,带着与世界对话的思路,自己会有意识地重新构建作品风格,让国外读者能够具体感受到中国文化内核精髓在其间流淌。只有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坚持文化创新,才能提升网络文学的竞争力,推进传播进程。

网络作家我吃西红柿从作品《盘龙》谈起,认为要写出中国读者与海外读者都喜欢的故事,就要把中国文化融入其中,让故事充满魅力,要写出跌宕起伏、让人回味无穷的情节,让读者与人物感情产生共鸣。

网络作家管平潮说,中国网络文学承续通俗文学血脉,又天然具备强大的传播力,是价值观传播的有效载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非凡的智慧,网络文学作品要积极主动承担起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使命,展示大国气度,同时尊重国际通行的表达方式和审美意趣。

(刘晓闻)